

格薩爾研究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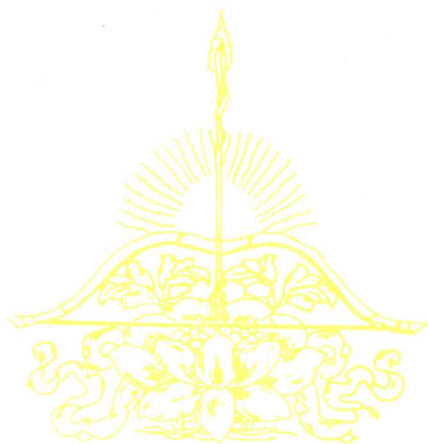
ཀླུ་མཚན་ལོ་ལོ་ལོ་ལོ་ལོ་ལོ་

土登尼玛

周锡银主编

《格薩爾》 论稿

刘立千



格萨尔研究丛书

《格萨尔》论稿

刘立千

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编印

《格萨尔》论稿

刘立千著

四川省《格萨

四川省川新出内（94）准印证034号

编辑：四川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成都市西马棚街47号

印刷：西马棚街小学印刷厂



格薩爾研究叢書

歐陽高題

歐陽高 題簽

ཀུན་ལྷན་དུ་བསྐྱོད་པའི་ལོ་རྒྱུས་ལྟར་ལོ་རྒྱུས་ལྟར་

扎西泽仁 题签

序

王雨顺

在我国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地区广为流传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以其篇幅浩繁、场景壮阔、结构宏伟、诗文绚丽而著称于世。它那包罗万象的内涵，是我国藏族历史、社会、思想、生活的总汇。涉及到藏族的文学、艺术、宗教、历史、阶级关系、民族交往、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是我们今天了解、研究古代青藏高原的一部百科全书。

难怪中外学者把《格萨尔》史诗，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对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贡献。

—

对《格萨尔》这部英雄史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十分关心它的抢救工作。50年代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搜集和翻译。当时组织了有200多人参加的“《格萨尔》史诗调查团”，深入到青海、四川、西藏、甘肃等省区，开展搜集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据1961年初统计，从民间搜集到的手抄本、木刻

本达150余部，除去内容大体相同的异文本外，实际搜集到34部。同时，还组织人力将其中的74部翻译成汉文，计1000余万字，为以后进一步开展《格萨尔》史诗的研究、整理、翻译工作，积累了珍贵的资料。

正当抢救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遇上了文化大革命，这部伟大的藏族史诗，也在劫难逃。数年搜集和翻译的资料，几乎被全部付之一炬。曾经参加过抢救工作的同志，也备受摧残，甚至因之而献身*。《格萨尔》史诗被打成“毒草”，抢救工作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粉碎“四人帮”后，遭到十年动乱严重破坏的中华大地百废待兴。党和国家十分关心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央及西藏、四川、青海、内蒙、甘肃等有关部门，即为被打成“毒草”的《格萨尔》史诗，恢复了名誉。并先后将其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七·五”、“八·五”规划的重点研究项目。成立了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七省区的《格萨尔》抢救工作。西藏、四川等七省区也相应成立了省级领导小组，由省自治区领导直接抓这项工作。从此，我国的《格萨尔》工作进一步走向正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的大好形势。

*《贵德分章本》的搜集者、汉译者华甲，即于1966年因《格萨尔》史诗是“大毒草”，而被迫害致死。

十余年来，由于得到各级党政的支持，得到广大蒙、藏、汉族群众的热情帮助，到1991年底北京举办“《格萨尔》成果展”时，搜集到的分部本已达141部，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4倍多。原保存于青海省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散失的翻译资料，又基本搜集齐全了。同时还组织力量深入牧区，进行说唱《格萨尔》的民间艺人的普查工作，发现了许多优秀的民间说唱艺人。西藏的扎巴、玉梅，四川的仁孜多吉、青海的仓央嘉措，即是这次普查的收获。他们都是能说唱数十部《格萨尔》的民间艺人*，被视为我们国家的国宝，其中扎巴等10人，在1991年还被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授予“《格萨尔》说唱家”的称号。并将其中12人的说唱记录本整理出版，列入国家“八·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在搜集各种版本和对艺人说唱录音记录的基础上，也同时开始整理和出版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七省区及北京已出版藏文本62部、蒙文本9部，汉译本30余部。仅四川省就整理出版了13部藏文本，有的还进行了第三次印刷，累计数达50余万册。全省百万藏胞，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册。这正说明广大读者，对《格萨尔》工作的肯定。

* 扎巴自报43部；玉梅自报60部；仁孜多杰自报29部。

二

十年来，虽然《格萨尔》工作的重点是抢救，也就是搜集、整理和适当地进行一部分汉译。同时，对它的学术研究，也十分活跃。

1983年和1985年就先后在西宁和赤峰两地，召开过“《格萨尔》史诗学术讨论会”，由于当时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因而提交会议的论文，对史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及其内涵的讨论，还有局限性，文章无法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探讨。直到1989年底，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大规模研究《格萨尔》史诗的帷幕，才算正式拉开。

到现在第二届、第三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已先后召开，第四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已决定1996年在兰州举行。这就告诉我们：国际性研究《格萨尔》史诗的热潮，已经来到。《格萨尔》史诗，将与《伊里亚特》、《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同登世界艺术殿堂。那种“中国没有史诗”^{*}的论调，从此

^{*}黑格尔在其所著《美学》一书第三卷中说：“中国人没有史诗，（因为）他们关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这位被恩格斯称作“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的哲学家，以权威的口吻，做了这个断言，其影响是相当大和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没有史诗”，即几乎成了定论。

休矣。

据不完全统计，从1989年首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以来，到1993年底止，在国内省以上报刊发表的学术论文即达176篇。如果加上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所提交的论文，二者加在一起，当在400篇左右（土登尼玛的《格萨尔词典》及王兴先、降边嘉措、吴伟等的专著尚未计算在内），仅在短短的4年中，即有如此大的收获，这在世界学术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即如早已誉满世界的《伊里亚特》和《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等史诗，在它们成为研究热点时，也从未达到每年平均研究文章百篇以上的盛况。

国内外学术界，对《格萨尔》史诗如此重视，相信《格萨尔》工作者们所向往的出现一个《格萨尔》研究体系的局面，已为期不会太远了。

三

为了更好的推动《格萨尔》史诗的研究工作，四川省《格萨尔》工作办公室编辑了这套丛书，目的主要有二：

其一，丛书的编辑，实际是对我国60年来《格萨尔》工作成果的一次展示。虽然今天《格萨尔》史诗，已饮誉世界，可过去几百年来，它除了藏区流传外，就连我们这个被称为

格萨尔故乡的四川省，也还鲜为人知。要不是在50多年前任乃强、韩儒林、彭公侯诸先生的大声疾呼，建国后党和政府的重视，也许今天它们仍未走出藏区，更不说饮誉世界了。在丛书第一辑中的第一分册即系任乃强先生的传世之作《藏三国》，文章虽不长，仅有400余字，它刊登于1930年的《四川日报》上，这是迄今为止在国内搜集到介绍《格萨尔》史诗最早的一篇文章，距今已有64年。文集中任老撰写的《“藏三国”的初步介绍》这篇论文，其精辟独到的见解，至今尚为《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经常引用。继任老之后，对《格萨尔》研究颇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层出不穷，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丛书将收录30名学者的文章陆续集辑成册，既有老一辈的，又有中青年后起之秀。虽工程浩大，仍将挂一漏万。

当今《格萨尔》史诗，不但走出藏区，而且登上世界艺术殿堂，这与60年来无数《格萨尔》史诗工作者不遗余力的宣传、介绍、研究分不开。所以我说这是一次《格萨尔》工作成果的展示。

第二，60余年来，虽然《格萨尔》史诗的研究者、爱好者撰写了大量文章，而这些文章都散见于国内大小报刊，它们对《格萨尔》史诗得以走出藏区，饮誉世界功不可灭。可直到今天，这些文章极少结集成册，其中不少仅在

“索引”中出现，很难窥其庐山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难免散失，而失掉其借鉴价值，这将是一个无以弥补的损失。所以说，这个丛书的编辑，也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抢救。

目 录

《格萨尔王传》中的林·格萨尔…………… (1)

从《格萨尔史诗》看古代青藏

高原上的部落社会…………… (35)

《天界篇》前言…………… (116)

默默耕耘的藏学家

刘立千…………… 周锡银 (118)

刘立千先生主要译著…………… (124)

《格萨尔王传》中的 林·格萨尔

我在1948年得到藏文《格萨尔王传》的开头三本：第一本是《天界篇》，第二本是《降生篇》，第三本是《赛马篇》。三书均系德格林葱土司家的木刻版。当时在谢国安老师的指导下，我把这三本书都翻译了。1950年我随军进藏，稿子留在原单位，以后一直没有过问。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提出要我把过去所翻译的藏文书籍，重新审定，准备出版，这时我才记起了这个译稿。感谢四川民委代我保存了第一本《天界篇》的译稿（此稿原译名为《格萨尔王传·神灵品》），其余两本，是未经整理过的散页，已遗失了。

《天界篇》现在据以审定的版本系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藏文版，（汉文名为《仙界遣使》）原书未署作者姓名，也未写时间。只有在第二本《英雄降生》和第三本《赛马登位》（均系四川民族出版社1980年版）两书才有个后记，知道作者名居美吐丹降仰扎巴，但不知道是何许人。在叙述写作此书的缘起时，他说写此书，一是受了德格八邦寺迦玛噶举派大活

佛降仰钦则(1820~1892)的指点(据说,降仰钦则活佛的母家,就是林的木波栋族);二是降仰钦则的弟子木旁·降白吉比多吉(1846~1908)是甘孜州石渠县的一位有名佛学家,也是作者的上师,曾撰写有关格萨尔的宗教著作,他就是从木旁所著的武圣格萨尔的仪轨和祈祷文中得到启示,获得写作灵感的;三是德格土司其美朱比第为他提供一些古书和写作用的纸笔,以及其他物质资助,指示要他从速撰写。上述这些和作者有关的人物都是公元十九世纪的人。另外,作者在写《降生篇》时,还参考了布拉洛布的《降生篇》稿,和它求得一致并加以补充。布拉洛布也自称他是木波栋族的后代,还写过《门林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藏文版、汉文标名为《格萨尔王传——门岭大战》)。布拉洛布在《门林篇》后记中说他是在火鼠年开始写著此书的。根据法国石太安的考证,这个火鼠年应为清光绪二年丙子(1876)。因此可以推断本书的作者和他所著这“史诗”的时间,可能是在公元十九世纪的后期。

关于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目前已发现的口头说唱和手抄本、木刻本,就有六七十种,长达一百数十万行,是目前世界上最长的史诗。

历史上出现了有各种称呼的格萨尔,如最

早在《嘛呢丛书》中就出现了格萨尔军王的名称。叙述的历史是松赞干布时代（公元七世纪），各邻邦的使臣向唐室求婚之事，此书是十一世纪时从“伏藏”中发掘出来的。其次是《五部遗教史》中提的北方格萨尔军王。此书记的是赤松德赞时代（公元八世纪）的历史。那时在吐蕃北方的民族有回鹘或者突厥。北方格萨尔军王，就是回鹘或突厥的格萨尔。至于同书中又提到朱孤格萨尔为吐蕃所败，并将其部族移于洛门。这个朱孤是指吐谷浑（见《五部遗教史·国王遗教》59页）。《五部遗教史》也是1347年邬坚林巴从“伏藏”中发掘出来的书。《米拉日巴道歌》中所提的格萨尔军王，是指北方格萨尔。其他萨嘉·索南坚赞的《吐蕃王朝世系明鉴》提的格萨尔军王，保沃祖拉逞瓦的《智者喜筵》提的昌格萨尔，五世达赖的《西藏王臣记》提的也是格萨尔军王。这些格萨尔，都是松赞干布时向唐室请婚的北方的格萨尔，与《嘛呢丛书》中所说是一回事。上三书只有《智者喜筵》提的是昌格萨尔，其余上二书均提格萨尔军王。这昌格萨尔又是何人？查《世系明鉴》内五国遣唐婚使中，有巴达霍尔王，而无英俊昌王。《王臣记》内五国婚使中，有英俊昌王而无巴达霍尔王。吐蕃时昌即指的是今新疆哈密一带，唐时为回鹘人（霍尔）所居。可见昌王或昌格萨尔，就

是回鹘格萨尔或霍尔格萨尔。由于他们在吐蕃的北部，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北方格萨尔，《于阗授记》中也有昌格萨尔的名字。《本教源流》说为降伏魔王，格萨尔王降生于北方昌王之家。从这一句话就完全可以证明了。古代书上所说的格萨尔不外是北方回鹘的格萨尔和朱孤格萨尔两个格萨尔。

至于《王臣记》中还谈到另一个格萨尔，就是五世达赖喇嘛根据《朗氏家族史·灵犀宝卷》提出来的林主·格萨尔（《西藏王臣记》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藏文版164页）。他和上面所说五国婚使的格萨尔并不是一个人。

就在“史诗”中也有同时出现两个格萨尔的。“史诗”中叙述林格萨尔的所处朵康林国的地形时说：林国的北方有格萨尔地，如现呈供品之状（《降生篇》61页）。其他在《邓玛青稞宗篇》等书中也均有两个格萨尔同时出现在一本书中的情况（见王沂暖《谈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载西北民族学院1979年学报第一期）。两个格萨尔，一指的是北方霍尔格萨尔，一指的是本书的主人公林·格萨尔，这是非常清楚的。

从上面看来：格萨尔这个名字，只是一种称号，不是专有人名。格萨尔这一称号是与英雄人物联系在一起的。

格萨尔的故事流传很久，范围也很广，由